

司马迁 思想与

《史记》人物论稿

杨宁宁——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司马迁

思想与

《史记》人物论稿

杨宁宁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马迁思想与《史记》人物论稿 / 杨宁宁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12
ISBN 978-7-5598-2327-4

I. ①司… II. ①杨… III. ①司马迁(约前 145 或
前 135-?) —人物研究—文集②《史记》—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5.81-53②K20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4047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黄轩庄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昭泰子隆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南宁市友爱南路 39 号 邮政编码: 530000)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50 千字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本书出版得到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一流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序



广西民族大学的杨宁宁老师曾于1999年9月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作访问学者，系里分配我充任杨老师的指导教师，于是我有幸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与杨老师有了较多一道学习、讨论、交流的机会。杨老师朴实坦诚、积极主动，不论是与指导教师定期研究商讨一年访问的主要课题，还是旁听北师大文学院重点教师的课程，以及对北师大其他学院重点老师的采访等等，都安排得很紧凑、很周到。杨老师系统地听了一遍我给本科高年级学生开的《史记》专题课，并对《史记》中的重点篇目进行研究，最后提交了三篇论文：《是反抗强暴，还是统治者的杀手——对司马迁〈刺客列传〉的再认识》，刊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当代文萃》2000年第5期全文转载；《论司马迁的复仇表现与超越》，刊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论司马迁复仇情结的产生》，刊载于《社会科学家》2001年第3期。这三篇论文不仅都发表了，而且都刊发于中文核心期刊。我为她一年中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这充分说明她这一年的学习是努力的、认真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在杨老师北师大访学的这一年里，当时的全国《史记》联络组与河南大学的王立群、白本松等老师商定，要由河南大学文学院发起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史记》研讨会，此会于1999年10月在开封市菊花盛开的季节召开了。到会者共四十多人，会议发起者有白本松、王立群、王利锁，联络

组的人有可永雪、袁传璋、张大可、韩兆琦，青年同志以河南籍的老师为多，北师大方面的访问学者有杨宁宁、于东新，博士生有陈曦、梁晓云等。杨老师从这次会议开始就成了《史记》研究队伍中的一员，《史记》研究会正式成立后，她与在师大先后作过访问学者的老师刘玲娣、吴淑玲、康清莲、何梅琴等几乎都成了每次《史记》年会必然参加的积极性最高的会员了。据我所知，她们每个人至少都出版过一本有关《史记》的读物，多者都有两三本了。

近些年来，杨老师给本科生开设了“《史记》研究”的选修课，选课人数很多。后来她把“《史记》研究”选修课的范围扩大到了函授生、古代文学研究生及全校本科生的通识通选课。她还开设了“《史记》的文学描写与历史解读”“《史记》与《汉书》”“史传文学”等几门《史记》的选修课及研究生课程。杨老师早在2005年就已经出版了《〈史记〉人物的性格与命运》，2013年出版了《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食客文化》。后者曾获得了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现在她又把近些年发表的新作收集起来，连同旧有成果合编在一起，名叫《司马迁思想与〈史记〉人物论稿》，请我作序。

杨老师的新作我看了一些，感到杨老师接触的范围很广，思考与论述的问题很多，很受鼓舞，也很长见识。比如她分析了项羽、李广等人物形象，与前些年人们那种一味地赞颂与空洞地同情他们的“不逢时”、具有“悲剧性”大不相同，而是指出了《项羽本纪》与《李将军列传》这类文章的“文笔”多于“史笔”；并深刻地指出了项羽的“重情义，失仁义”“有侠义，无道义”，以及“嫉妒之心引发其道德错位”等，这样的分析方法都是十几年前不大见到的。她又以表格的形式把李广、卫青、霍去病三人历次出征匈奴的战斗表现与战果加以排列，指出李广的“不能封侯”，不是因为什么“命运不好”，而是“表现不佳”，“他根本就不是一

个合格的将领”。由于李广祖孙三代结局悲惨，司马迁对他们心生同情。加上他“置身于西汉朝廷的政治是非纠纷当中，使他有时候看问题评价人物难免从个人的感情和好恶出发”。

杨老师研读文本细致，善于发现问题。她从《刺客列传》收录了帮着公子光刺王僚的专诸，而不收录帮着公子光刺庆忌的要离这一现象，进一步总结出了司马迁评价刺客人物高下的标准，并同时比较充分地解释了《刺客列传》中聂政之所以被司马迁特别看好的原因。这些都令人很受启发。但《刺客列传》中的五个人物，立场思想各不相同，惟“荆轲”其人有反压迫、反强权的侠义性质，司马迁表现荆轲的这段文字本身也多有“词不达意”之处，故而对于荆轲、高渐离、田光等人似乎不宜笼统地加以贬抑。

杨老师的《史记》研究能与当下的现实相结合，体现了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宗旨。目前电视宫斗剧火爆荧屏，很受女性观众青睐，于是她在文章《重述历史语境下的〈史记〉后宫史事与电视宫斗剧》中，以重述历史的视角观照宫斗剧，指出《史记》后宫人物对宫斗剧有诸多影响，例如经历传奇，励志成功的人物塑造，妒忌争宠及太子之争、权力之争，无不在宫斗剧中反复上演。同时肯定宫斗剧对《史记》的继承与发展，如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揭示，对人性自私、贪婪的揭露，对后宫生活如何将人由善变恶，逐步走向毁灭的过程无情地撕开展现给世人。肯定了宫斗剧对历史题材的发掘和利用，在形式、手法上都有发展创新。

与杨老师一道研读《史记》、一起切磋琢磨的日子，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希望在今后的五年、十年，乃至更远的未来，能时常读到杨老师的文章，庶可温故知新，与时俱进。

韩兆琦

2019. 01. 25

第四章 社会万象与人物…………… 一七九

从《史记》看西汉酷吏的性格人生…………… 一七九

从《史记》看古人交友…………… 一九六

论司马迁的孝道及孝道思想…………… 二二三

第五章 《史记》人物对后世的影响…………… 二二九

论赵盾形象文学化发展对元杂剧《赵氏孤儿》的影响…………… 二二九

重述历史语境下的《史记》后宫史事与电视宫斗剧…………… 二四五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史传文学研究…………… 二六四

建国以来《史记》人物研究综述…………… 二七七

附录…………… 二八七

高歌一曲颂忠良——读《后汉书·党锢列传》…………… 二八七

主要参考文献…………… 二九七

后记…………… 三〇六

目 录

第一章 司马迁的复仇思想与人物·····一

对司马迁《刺客列传》的再认识·····一

从《刺客列传》不记载要离看司马迁的选录标准·····一四

论司马迁复仇情结的产生·····二七

论司马迁的复仇表现与超越·····三七

第二章 司马迁的英雄思想与人物·····四九

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四九

在「义」的视阈下看项羽的道德错位·····六八

项羽文化的理论建构与内涵阐释·····八〇

论历代咏项羽诗及其道德评价·····一〇〇

第三章 司马迁的食客观念与食客·····一二七

古代的「食客」定义与身份辨析·····一二七

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群体·····一二四

食客文学集团与食客文学·····一四七

司马迁的复仇思想与人物

对司马迁《刺客列传》的再认识

《刺客列传》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一篇人物类传，长久以来人们对它评价很高。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称赞：“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¹这一观点在许多文学史中带有普遍性²，他们都把刺客的行刺行为赞扬为“反抗强暴”。事实真是如此吗？仔细阅读《刺客列传》就不难发现这一评价确实太高了，它缺乏客观性，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对刺客行为究竟如何评价？笔者以为要认真分析其行刺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还要考察司马迁写作时的创作心理，在此基础上评价《刺客列传》或许会公正客观些。

1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154页。

2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第216页；郭预衡：《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212页；裴斐：《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第136页；马积高、黄均：《中国文学史》上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第209页。

一、报恩乃刺客行刺之动机

司马迁在《刺客》中记叙了五位刺客的事迹：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其中曹沫劫齐桓公，荆轲刺秦王的史事是司马迁的原作，专诸事，豫让事，聂政事出自《左传》和《战国策》。五人中撇开其他因素来看，以曹沫的行为最有意义和价值。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

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於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¹

曹沫劫持的动机是为了国家利益，并且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许多材料证明，曹沫一事给人留下的疑点很多。首先，《左传》中未见有曹沫其人，有些注本推测曹沫即曹刿，但没有可信的材料证明。其次，写曹沫与齐三战三败一事也不符合实情。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引梁玉绳注：“庄公自九年败乾时，后至十三年盟柯，中间有长勺之胜，是鲁只一战而一胜，安得有三败之事？”²“况鲁未尝战败失地，何用要劫？”³再次，书中写鲁“献遂邑之地以和”，梁玉绳认为“遂非鲁地，何烦鲁献？此皆妄也”⁴。由此推测，曹沫一事多为司马迁的文学创作，而非历史事实，因此，其事件的意义和价值暂且

1（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85，第2515页。

2〔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刺客列传》，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第3892页。

3〔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刺客列传》，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第3893页。

4〔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刺客列传》，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第3892页。

不论。

“荆轲刺秦”一事在文中占了大半篇幅，是司马迁倾注感情记述的战国末期的一件真实事件。至于《战国策》中有关荆轲刺秦的事件，已证实是西汉人整理《战国策》时将司马迁文补入的，并删掉了高渐离刺秦一事。荆轲是司马迁刻画得非常成功的一个刺客。在荆轲看来，他刺杀的秦王是有名的暴君，因此，其行刺似乎可以说是真正的“反抗强暴”了。荆轲行刺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豪气，他受田光之托即舍生赴难、义无反顾的大义之举，无疑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再有田光为激励荆轲而自刎，樊於期为助荆轲成功献出自己的首级，还有高渐离他们的前赴后继都具有感人的悲壮美。尽管荆轲的行刺没有成功，但是他对后世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遗憾的是我们分析考察他的行刺动机时发现，他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么崇高伟大，甚至可以说他的行刺有一定的盲目性。

文中说荆轲是卫国人，他“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¹，他离开卫国。不久卫被秦所灭，荆轲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亡国之痛，没有张良那样刺秦复仇的行动，也不像太子丹有国破家亡的危机感。因为在当时一般百姓和士阶层中，国家观念是比较淡薄的，所以，朝秦暮楚、楚材晋用的现象在当时比比皆是。而在贵族阶层中，国家意识却是很强的，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有封邑和特权，一旦国家灭亡，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和财富将丧失。荆轲也没有樊於期那样“父母宗族皆为戮没”²的血海深仇。他最初接受田光之托助太子丹时，并不知道要行刺秦王。作为朋友田光很了解他，为了坚定他的决心，田光不惜“自杀以激荆卿”。即使这样，当太子丹将刺秦计划和盘托出时，荆轲

1 (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85，第2527页。

2 (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85，第2532页。

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和行动的危險，他推托曰：“此国之大事也，臣弩下，恐不足任使。”¹在太子丹“顿首，固请毋让”²的情况下，他才勉强答应。后来太子丹“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³。他刺秦的动机又加了一层报恩的因素。过去有人认为荆轲刺秦乃出于“士为知己者死”的动机，笔者以为这一评价不很合适，对荆轲形象有拔高之嫌。我们不可否认作者在塑造荆轲形象时有表现“士为知己者死”的主观意图，但客观效果却不是这样。据司马贞《史记索隐》记载：

燕丹子曰：“轲与太子游东宫池，轲拾瓦投蛙，太子捧金丸进之。又共乘千里马，轲曰‘千里马肝美’，即杀马进肝。太子与樊将军置酒于华阳台，出美人能鼓琴，轲曰‘好手也’，断以玉盘盛之。轲曰‘太子遇轲甚厚’。”是也。⁴

盛情之下他刺秦已别无选择。可见荆轲刺秦并不是出于“士为知己者死”，而是为利益所驱使，成为太子丹豢养的一个复仇工具。

专诸与吴王僚无冤无仇，与吴王僚有怨仇的是公子光。专诸行刺的动机，一是伍子胥的推荐，出于友情；二是专诸得到公子光“善客待之”⁵，为了报恩。公子光对专诸施恩是希望专诸替他除掉吴王僚，正如其他几位贵族与刺客的关系一样，说穿了不过是一种等价交换的买卖。公子光与吴王僚的怨仇不过是统治者之间的权力之争。从史书看，吴王僚并非暴君，故专诸的行刺就不能说是“反抗强暴”了。客观地说，专诸不过是公子光雇佣的一个杀手，是统治者矛盾斗争的牺牲品。

1 (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85，第2531页。

2 (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85，第2531页。

3 (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85，第2531页。

4 (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85，第2532页。

5 (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85，第2517页。

（豫让）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於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於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於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¹

豫让行刺是为恩主智伯报仇，因为智伯视他为“知己”，待他以“国士”。智伯国士待豫让的真实情况如何呢？《吕氏春秋·不侵篇》载：

豫让曰：“我将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饥而不我食，而时使我与千人共其养，是众人畜我也。夫众人畜我者，我亦众人事之。至于智氏则不然，出则乘我以车，入则足我以养。众人广朝，

1 （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85，第2519—2521页。

而必加礼于吾所，是国士畜我也，夫国士畜我者，我亦国士事之。”¹

智伯与豫让真是“知己”吗？我们说“知己”应当是彼此间的心心相印，甘苦与共，平等相待。若彼此有君臣主仆关系，还应该加上知才爱才用才。如秦昭王与范雎，燕昭王与乐毅等。可是豫让追求和满足的不过是生活待遇的优厚，而不是成为范雎那样为国君所器重的谋臣策士。所以，明人何孟春认为豫让算不上国士，因为“让不能知韩魏之必反，无贵于让；知而不言，非所以望；让言而智伯弗听，则智伯之遇让也，不过利禄之优异于范、中行氏之所遇耳”²。何孟春的意思是，“豫让没有国士之才，他耿耿不忘报仇，只是不忘其利禄之优异耳”。从历史上看智伯与赵襄子并无本质上的差别，都是贪婪狡诈之君，但智伯比赵襄子更狂妄自大，豫让不过是他们矛盾斗争的牺牲品。

聂政为严仲子刺杀韩傀，起因也是严仲子与韩傀矛盾纷争。严仲子为除掉韩傀而选中聂政为刺客，并“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³。为感激严仲子的“厚爱”与“器重”，聂政在母亲去世后，替严仲子刺死了韩傀。可见专诸、豫让与聂政都充当了统治者的杀手，成为统治阶级矛盾斗争的牺牲品。从性质上看他们的行为绝不是“反抗强暴”。著名学者徐朔方指出：

侠者是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在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之外，用来争权夺利的一种补充手段。布衣之侠的地位是卑微的，但是不管他们具有多么崇高的品德，他们的本领，连同整个灵魂都已经被统治者所收买，成为他们手中温驯的工具。⁴

1 (秦)吕不韦等：《吕氏春秋集解·不侵篇》，许维通校释，中华书局，2009，第271页。

2 杨燕起：《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624页。

3 (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85，第2522页。

4 徐朔方：《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第187—188页。

二、史学家皆否定刺客

我们查阅二十四史及清史书目，惊奇地发现除《史记》之外，再无任何一部史书设立《刺客列传》，包括班固的《汉书》。要知道，西汉是游侠复仇之风盛行的时代。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被二十四史（含清史）的编撰者所继承，但是在设立类传时，他们又都摒弃了“刺客”这一类传。原因何在？显然史学家们不以类传的形式设立“刺客列传”，目的是想弱化并消除刺客的社会影响，他们在对待刺客问题上，与司马迁有着本质的差别。苏辙认为：

太史公传刺客凡五人，皆豹、翩（春秋的齐豹、公孙翩皆弑君）之类耳，而其称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

诸侯弃甲兵之仇，为盟会之礼，乃于登坛之后，奋首而劫国君，贼天下之礼者非沫乎？君臣之义，有死无限，专诸感公子之豢养，而亲剗刃于王僚，贼天下之义者非诸乎？以贼礼贼义贼仁贼信之人并列于传，又从而嗟叹其志，不亦谬哉？¹

苏辙认为司马迁赞扬刺客破坏礼义仁信的做法很荒谬。黄洪宪指出：

侠累与严仲子非有杀君父之仇，特以争宠不平小嫌耳。在仲子且不必报。何至挺身刃累，而自裂其面，碎其体以为勇乎？以为义乎？此以羊豕之货屠为肉何异，愚亦甚矣！²

班固也批评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³。可见史学家对刺客是否定的，对司马迁褒奖刺客的做法也提出了批评。应该说他们的意见是中肯客观的，有其合理性。

1 杨燕起：《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623—624页。

2 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363页。

3（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96，第2738页。

徐朔方在《史汉论稿》中对司马迁也提出了较尖锐的批评，他说：

司马迁打破封建名位的拘束，敢于大胆地站在卑贱者一面，十分难能可贵，但是他没有看到他们究竟为哪一个阶级服务？起着什么社会作用？对历史学家来说，这是评价人物的首要问题。¹

他还说：

编写历史著作而囿于个人的恩怨得失，即使在司马迁那样高明的笔下，也会产生偏见，对不应该肯定的侠者加以肯定，这应该是对后人的一个教训。²

三、司马迁《刺客列传》的创作心理

事实上司马迁对刺客的危害性是有所认识的。他在《游侠列传》开篇引用了韩非的话：“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³既如此，他何以要设立《刺客列传》呢？并以“《史记》中第一种激烈文字”⁴来颂扬危害社会的“第一种激烈人”⁵呢？我们有必要对司马迁的创作心理做一些分析研究。

（一）寄情言志的心理

心理学家认为：儿童少年时期的文化接受主要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即通过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接受，渗透到人的心理的各个层次和人格结构中，童年时期的这种无意识接受对人的影响往往要比

1 徐朔方：《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第187—188页。

2 徐朔方：《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第187—188页。

3（汉）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华书局，1985，第3181页。

4（清）吴见思：《史记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52页。

5（清）吴见思：《史记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52页。